

上卷



云南民族工作 40年

云南民族出版社



云南民族工作四十年

上卷

云南民族出版社

顾 问

孙雨亭 王连芳 陈其文 刘树生
江 平 黄 铸

编写组（按姓氏笔画排列）

主编 马 曜
成员 尹宣公 刘介农 陈 琦
季俊山 和即仁 赵 卓

前　　言

1989年4月，中共云南省委民族工作部、云南省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作出编写《云南民族工作四十年》的决定，委托马曜等七人组成编写组，先后聘请孙雨亭、王连芳、陈其文、刘树生和江平、黄铸六位同志为顾问，在广泛征求意见和多次研讨的基础上，于同年10月提出编写提纲，积极查阅档案，搜集资料，1990年初正式开始编写。在编写过程中，先在组内讨论，互相修改补充，每完成一章，立即送省委民族工作部和省民委，分送省委副书记尹俊、副省长赵廷光和顾问同志，根据他们提出的意见，认真进行修改。1992年下半年，省委民族工作部和省民委的主要负责同志陆续退回审稿，表示同意；同时征得尹俊副书记、赵廷光副省长和孙雨亭、王连芳、陈其文、刘树生四位顾问同志的同意。马曜同志于1993年12月将书稿的“前言”和第一编至第五编带到北京，请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顾问江平同志和黄铸同志担任本书顾问，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并亲自审阅了大部书稿。

编写本书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内容

顾名思义，《云南民族工作四十年》所记述的是新中国建立四十年云南民族工作的发展过程和经验。我们力求坚持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依据，充分运用档案中的可靠材

料和民族工作的实践，如实地反映成绩和失误，不虚美，不掩过，用实践检验我们的政策措施是否符合民族实际，从中吸取经验。

本书结构采取编、章、节的形式，编内有章，章内有节，节内再以数字一、（一）等分为若干层次。全书分为上下二册，共约100万字。上册为正文，分为五编：

第一编，《云南各民族的地理环境及其历史社会和政治经济文化特点》。主要分析新中国建立前云南各少数民族的特殊省情。今天的云南各民族是历史的云南各民族的一个发展。建国前云南各民族的实际是建国后云南民族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因此，本编用较多的篇幅叙述云南各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人口分布、民族源流；历代民族政策与民族经济发展的关系、历史上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关系；云南各族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各民族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历史上的对外关系等。这些都是云南各少数民族历史的和现实的最大实际。封建统治阶级的民族政策具有二重性，为了实现对少数民族的阶级统治，历代中央政权对云南地方政权的设置和治理，都注意到适应民族特点，如汉代的边郡制度、唐代维系统治少数民族的羁縻政策和元代的土官制度，明代的土司制度，清代的改土归流等，这种因地制宜的措施，对于今天的民族工作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二编，《以社会改革和经济建设为基本内容的四十年工作历程》。主要从纵的方面记述建国后到1989年云南民族地区重大政治社会改革以及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实事求是地总结取得重大成就和遭受挫折的经验。

第三编，《贯彻执行以民族区域自治为中心的各项民族政策》。本编是专题性的，包括推行民族区域自治，保障杂居、散居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团结少数民族上层爱国人士，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和发展，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等七个专题，每一专题采取纵横结合的方式加以论述。

第四编，《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建设》。从艰难的起步开始，以取得巨大的成就结束，分别论述了民族自治地方的农林牧业和乡镇企业，工业、交通和邮电通信，商业和财政金融等事业的曲折发展过程。本编着重论述了发展民族经济的一些重要经验：例如，立足本地资源和市场需要，发展优势产业，如德宏发展蔗糖，西双版纳和河口发展橡胶以及其它地区因地制宜地发展茶叶、紫胶、热带水果等，内地和边疆的一些民族区发展两烟和冬早蔬菜等；二是国家开发资源与发展民族经济相结合，如开发新平鲁奎山铁矿，带动乡镇企业的发展；三是以元江、孟连为代表的山坝结合，如元江发展水电事业，开发热区，动员山区民族下坝易地开发；四是以宁南为代表的智力开发与经济开发相结合；五是发展民族贸易和边境贸易，内贸与边贸相结合，培育市场机制，以开放促开发，等等。

第五编，《民族地区的文化建设》。分别论述了民族教育，科学技术事业、民族艺术事业，新闻出版和广播事业，医疗卫生事业，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少数民族的传统体育事业的发展过程。

本书下册为附录、附表。附录分为附录一：“云南民族工作大事记”，记述了1950年至1992年云南民族工作的重大事件和要闻；附录二：“云南历代政区沿革”；附录三：“民主改革前云南二十五个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形态”；附录四：“云南少数民族历史人物简介”。附表包括：民族源流、民族支系名称、南诏大理纪年、1950年各地土司情况、中国云南与周边国家跨境民族人口分布、少数民族语言系属和文字类型、民族自治州、县和民族乡情况等。

回顾四十年的曲折前进历程，云南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政治社会改革和经济文化建设的伟大实践，虽然工作

中也发生过失误和偏差，但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巨大的。概括起来：

一是以民族区域自治为主要形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并逐步趋于充实。从1951年至1990年，共建立了8个民族自治州，29个民族自治县，有18个少数民族实现了民族区域自治。自治地方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51%，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少数民族人口的83%，是全国民族自治地方最多的一个省。

二是采取不同政策和形式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各少数民族分别从原始社会末期或原始公社向阶级社会过渡阶段的农村公社和家长奴隶制、奴隶制、封建领主制、封建地主制同步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立起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实践证明，处于前资本主义不同发展阶段的云南各少数民族，同样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当然，他们要比汉族花更多的时间去经历两个不可能逾越的阶段，即既不能逾越工业化和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阶段，也不能逾越教育普及和民族素质提高的阶段。

三是民族自治地方的工、农业生产和交通有了很大的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医治了“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逐步改变束缚民族地区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国民生产总值和工、农业总产值翻番。各民族自治州、县都程度不同地发展了工业，特别是原来没有什么工业的边疆民族地区，也建立起一批新兴工业。新中国成立时，云南三分之二的县城不通公路，到1987年，云南铁路、公路通车里程达5.2万公里，比1950年增长14倍，实现100%的县、98.7%的乡和62%的行政村通公路。民航已开通思茅、保山、景洪、芒市等地。云南以铁路、公路为骨干，四通八达的运输网络已经形成。随着工业、能源、交通和商业、边贸、旅游业的发展，全省民族地区出现一批新城镇。

四是民族教育、科学、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卫生、体育、图书馆、博物馆等各项文化建设事业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五是随着生产的发展，各族人民生活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和提高。平坝河谷民族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很大，人均消费支出逐年增长，农民的吃、穿、用、住房等几大项开支成倍增长。用于住房的开支大增。但在边沿和内地山区，仍有数百万少数民族尚未完全解决温饱问题。由于四十年中间一段时间出现“左”的干扰，使民族地区和全国一样，没有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更大成就。

从云南历史发展的纵向比，四十年的成就是伟大的；但从横向比，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特别是同沿海地区的差距很大，而且有越拉越大的趋势，这是值得引起重视的一个问题。取得这些胜利的根本原因，是党在四十年特别是前七年和后十三年的民族工作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原理同云南民族地区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照抄外国经验，也不照搬汉族地区的经验和做法，实事求是地进行工作的结果。

编写思路和历史经验

四十年来，云南民族工作也和其它工作一样，前七年和后十三年两头好，中间二十年差。历史上的错误主要来自“左”的方面。从1957年下半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二十年中，在“左”倾思想影响下，建国初、中期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受到干扰，使民族地区远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民族地区和全国一样才逐步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如果把四十年根本性的经验教训集中到一点，那就是能否从少数

民族的实际出发，坚持和发扬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确认识和把握民族地区的主要矛盾或主要问题。云南各少数民族的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水平比较落后，有近十个民族比汉族落后几个世纪，这就是云南民族的最大实际或主要问题。因此，应当以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各民族的社会生产力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建国初期，我们在民族地区进行属于阶级斗争范围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把民族经济搞上去。而不是其它。马克思发现经济是社会存在的基础。恩格斯曾经指出：“人们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这个“为繁茂复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了的“简单事实”。伟大的真理本来非常简单，然而要达到这个简单真理的共识，却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在全国已经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和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我们违反了八大路线，把抓阶级斗争当作目的，特别是1962年以后，全党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所困扰，在已经消灭了剥削阶级之后，仍然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当作社会的主要矛盾，把阶级斗争当作中心任务，一直用抓阶级斗争去促生产。从反“右派”、反“地方民族主义”、反“右倾机会主义”、“四清运动”，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都是在越“左”越革命的错误思想下出现的。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才毅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左”的错误方针，提出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从这个主要矛盾提出中心任务，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共同富裕。在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的国情中，云南大部分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更为滞后，层次更低，更加迫切要求把发展生产力

摆在首要位置。我们正是按照这个思路来编写《云南民族工作四十年》的。通观四十年的民族工作，我们深感有必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在以下五个方面探索和总结历史经验。

第一，要不断深化对云南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和重要性的认识。云南是中国多民族的一个缩影。云南民族问题在全国民族问题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影响。1980年10月，中央领导视察云南时指出：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是不是对头，在很大程度上要从云南体现出来，考验出来。云南的工作做得好不好，都会对我国的民族问题发生重大的、带头的影响。次年经中共中央批准，向全党发出的《云南民族工作汇报会纪要》指出：“全省党政军民各级组织和所有同志，都要充分认识做好民族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和重要性；都要把加强各民族的牢不可破的团结，作为执行每一项政策，和做好每一项工作和处理每一个重要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关系到边防巩固、祖国统一、安定团结和四化建设的全局性的重大问题，绝不可有任何粗心大意。”首先，历史和现实表明，民族问题是长期的，它并不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而消失，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都有性质不同的民族问题。民族与阶级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是由两种不同的社会条件构成两种不同的东西。阶级消灭了，民族问题仍然存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说明了这一点；民族问题也并不随着经济发达而立即消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说明了这一点。这是因为，民族问题除了阶级压迫即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外，还包括语言、文化、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方面的问题。例如，语言是人类最全面的交际工具和必不可少的思维工具，一视同仁地为社会各阶级服务。宗教的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将长期存在，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社会力量和自然力量对于人们不再是一种异己力量时，现实世界

的宗教反映才会消灭。语言和宗教信仰等并不随着阶级消灭而消灭，这就使民族问题的情形比阶级压迫复杂得多。在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宗教问题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矛盾，即使在民主革命时期，也不能简单地用阶级斗争的方法去对待民族、宗教问题。

云南民族问题的复杂性还表现在，民族种类多，各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民族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分布于不同地区的民族内部不同支系之间也存在一些问题；一个民族信仰几种宗教和几个民族共同信仰一种宗教同时并存，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又往往交织在一起，宗教问题容易转化成民族问题，等等。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是我们党在民族问题上采取慎重稳进方针的重要依据。云南民族问题的重点在边疆民族地区，建国以后，各级党委和干部都比较重视边疆民族工作，除了1958年和“文革”期间由于政策和路线错误引起边民外迁外，整个边疆民族地区一直都比较稳定，没有出现大的动乱。相反，在一些内地民族地区，由于忽视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出现民族问题或性质虽不属于民族问题而牵涉到民族关系，如1957年永善苗族和富宁瑶族事件，60年代寻甸白洋箐事件，70年代沙甸回族事件，80年代鲁甸事件和90年代的陆良事件等等。

多民族边疆省是云南的基本特点。在云南，民族问题的重要性表现在，占全省人口三分之一的少数民族分布地区占全省总面积的四分之三；生物、矿产、水能资源大部分在民族地区，在全省现代化经济建设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国境线长，既有国防和外交问题，同时也具有对东南亚和南亚开放的地缘优势。在不断深化对云南民族问题的“三性”认识中，还要看到，随着情况的变化和工作的发展，原来地处边陲的不利条件现在已转变成为有利于对外贸易的前沿；跨境而居的民族在对外开放中正在成为通向东南亚各国的有利条件，等等，对于加快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二，因地制宜地实行分类指导，正确处理共同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列宁在《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中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上，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一切民族都走到社会主义，这是共同性，每个民族的走法不完全一样，这是特殊性。没有特殊性，就没有共同性。在多民族的云南省，每个民族和不同民族地区情况都呈现出千差万别的复杂情况，这就要求我们从每个民族的实际出发；善于抓住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区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特点，采取特殊的政策和方法进行工作，绝不能搞“一刀切”，才能促进不同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建国初期，云南能从边疆民族地区特殊情况出发，采取“联合封建反封建”的和平协商土改和不分土地、不划阶级的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不同政策措施，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表现了民族工作的创造性和勇气。相反，1957年下半年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不从云南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大批“民族落后论”、“边疆特殊论”、“条件论”，大搞“一步登天”，“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形成生产关系上不断折腾，社会生产力不断下降。本来，对经济文化特别落后的边疆和内地山区约800多万少数民族，在他们获得解放以后，应当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以补先天之不足，逐步缩小同汉族地区的差距。如果说汉族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上达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水平，需要100年左右的时间，那末，少数民族地区所需要的时间就更长了。他们先天不足，又加上后天失调，导致二十年的经济停滞和衰退，所造成的恶果，至今尚未完全消除。

第三，正确处理发展民族经济与发展民族教育的关系。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指出：“在一个文盲的国家内是不能建成共

产主义社会的。”以提高文化为主全面提高人的素质，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保证少数民族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根本措施。发展教育与发展经济的关系十分密切，教育对经济是超前的，发展经济必须教育先行。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教会下一代如何劳动和生活，于是产生了同人类本身一样古老的教育。离开了教育，人类自身的再生产也不能延续和发展。这就是教育的本质和它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现在教育在全世界的发展倾向先于经济的发展。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既面临国内外发达地区的挑战，又有对外开放的机遇。当前国际竞争已由军事争夺转向包括教育科技在内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教育已成为生产力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决定性因素，它的社会职能更加突出了。

建国四十年来，云南民族教育取得了不少进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云南省委领导人提出了要“大彻大悟”，重视教育，在民族教育方面采取举办寄宿制、半寄宿制中小学，在普通中小学中注入职业技术教育的内容等措施，使民族教育的面貌有了显著改变。但从总的方面看来，四十年民族教育的失误，主要是把发展经济和发展教育割裂开来，错误地认为前者是硬任务，后者是软任务，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没有相应地发展教育，特别是民族教育，这不能不是民族经济上不去的重要原因。占全省少数民族人口三分之二的云南边疆和内地广大山区各民族，脱胎于前资本主义的不同母体，占人口 60%以上的人不通汉语，全省文盲近 1000 万人，大部分是边疆和山区少数民族，至今有些地区尚未完全摆脱刀耕火种生产，刻木结绳记事的落后状态，几乎没有自我发展能力。这些地区经济上不去，缺的不是资源而是文化和人才。实践证明，我们在这些地区短短几年内可以打倒一个阶级或者改变一个社会制度，而要提高一个后进民族的文化和生产力水平，却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现在大家都明白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对于治穷必先治愚，开发智力是开发经济的前提还

是重视不够的。

全面提高人的素质，还有一个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意义。少数民族人民没有文化，素质不高，就不可能参政、议政，行使和享受宪法赋予的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总之，必须从思想上真正解决发展教育和发展经济互相依存的关系，不能等待经济发展了再来发展教育，只有教育发展了，才能加快经济的发展。

第四，针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问题的两种客观发展趋势，正确处理党的领导和民族自己走路的辩证关系。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商品经济的发展，打破民族和地区之间的封闭状态，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密切，逐步形成全国统一的经济体系和统一的市场，增加了各民族互相“离不开”的物质基础。另方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民族发展和繁荣时期。随着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和进步，民族意识、民族感情、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亦将随之增强。这就要求我们正确对待民族感情和民族的自我意识，增进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团结合作。要使各少数民族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加强党对民族自治地方的领导和少数民族的自主和自治是一致的。加强党的目的，正是为了帮助少数民族自己走社会主义道路。民族自治机关要逐步做到民族干部比例与民族人口比例大体相当，切实改善民族干部结构，改善自治地方内部的民族关系。处理好民族干部与汉族干部、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以及干部民族化与共产主义化的关系。经常向各族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民族政策和民族平等团结的教育，坚决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同时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就在于不断缩小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经济文化上的差距，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要注意把汉族地区的先进技术和少数民族地区的丰富资源结合起来。国家对民族地区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要十分重视和保护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使

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和发展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随着当地资源的开发得到相应的提高。因此，要正确处理好上级国家机关与民族自治地方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中央和民族省区企事业单位（包括国营农垦系统和林场等）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关系。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认真处理好国家与民族自治地方的利益，继续落实财政、外贸、投资、税收、信贷、外贸等方面扶持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经济的优惠政策。处理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竞争中优胜劣汰和帮助扶持少数民族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

以上四条历史经验，是就四十年民族工作的总体而言的。本书在按问题分编的章、节中，对不同问题和不同时期的民族工作，都采取论从史出的方法，分别加以总结，力求从中得出规律性的认识。事物在不断变化，任何好的经验都不应变成妨碍我们继续前进的负担。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开始了一场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的革命。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例如，如何使民族政策适应于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新情况；再如，对外开放也加速边疆民族的国际交往，既迎来发挥区位优势的难得机遇，又面临与境内外民族相连的周边国家和平竞赛的严峻挑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既往的历史经验中是不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现成答案的。我们的任务在于正确总结和运用历史经验，提供人们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的启迪。

《云南民族工作四十年》编写组
1993年12月

目 录

前言	(1)
云南省民族分布图	(13)
云南政区	(14)

第一编 云南各民族的地理环境及其 历史社会和政治经济文化特点

第一章 多民族边疆山区是云南的基本省情	(3)
第二章 复杂的自然环境形成立体民族分布和立体农业	(6)
第一节 地理位置和自然概况	(6)
第二节 立体地形形成不同民族的立体分布	(13)
第三节 立体气候形成不同民族的立体农业	(14)
第三章 云南民族源流	(16)
第一节 藏缅语族源流	(18)
第二节 壮侗语族壮傣语支的源流	(23)
第三节 孟高棉语族源流	(24)
第四章 历代社会经济发展	(26)
第一节 封建社会时期的民族政策与云南经济发展的关系 ...	(26)
第二节 近代云南经济	(48)
第三节 少数民族的科技与文化艺术	(51)

第五章 近代云南各族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56)
第一节 鸦片战争到清末各族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	(57)
第二节 辛亥革命到护国起义时期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	
	(62)
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族人民的斗争	(63)
第六章 新中国成立前云南各民族社会经济结构特点和分布格局	(69)
第一节 形成各民族经济文化层次重叠和结构交叉的原因	
	(69)
第二节 一部活的社会发展史	(70)
第三节 由分布特点形成的三种社会经济格局	(71)
第七章 各民族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72)
第一节 各民族的语言文字	(72)
第二节 各民族的宗教信仰	(76)
第三节 各民族的风俗习惯	(95)
第四节 各民族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是构成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因素	(102)
第八章 中国西南门户和历史上的对外关系	(104)
第一节 秦汉时期云南与东南亚和南亚的关系	(104)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云南与东南亚的关系	(106)
第三节 南诏、大理时期云南与东南亚的关系	(107)
第四节 元明清时期云南与东南亚的关系	(108)
第五节 面向印度洋是云南对外经济贸易的区位优势	
	(114)